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8.5.001

李建福:“环境安全研究范式:内容与比较”,《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 5 期,第 1-15 页。

LI Jianfu, “Paradigms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Research: Comparison and Contents”, *Pacific Journal*, Vol.26, No.5, 2018, pp.1-15.

环境安全研究范式:内容与比较

李建福¹

(1.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摘要:环境安全研究主要有问题解决理论与环境安全批判两个研究范式。前者认为环境安全与资源枯竭、发展畸形、气候变化等都存在一定联系,但环境冲突的因果链较长,而且环境冲突与国家间战争存在明显界限。世界各国正在努力调整国家战略以缓解环境问题带来的冲突,同时国际社会努力构建后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机制实现国际环境和平。环境安全批判研究却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对传统安全的适应范围与解决路径提出质疑,并认为国际社会在资源枯竭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生冲突。因为新技术、替代能源、国际贸易等的发展使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技术或贸易满足能源需求进而避免冲突。环境安全批判研究对国家行为体的主导作用进行论争,提出“去国家中心化”的思路,并试图通过环境安全新话语提升国家权力。批判研究对气候变化的安全问题也提出质疑。环境安全批判学者对气候变化成因,影响范围与解决途径进行了全面批判。

关键词:环境冲突;环境和平;环境安全;环境安全批判研究;国际环境政治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8)05-0001-15

环境安全要素跨境流动能够带来国际环境变革、引发国际环境冲突。主权国家一方面出于国际政治利益分析,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并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出于国家利益考量阻止或限制人类的治理努力。^①国家核心价值观与民众普遍的安全认知推动学界从国家、地区、个人层面分析环境变化的不同成因、治理模

式以及缓解适应战略等,进而推动环境政治相关争论登上国际舞台,并将环境安全研究提升到新的国际高度。^②

环境安全研究认为:环境变革威胁国民生存、诱发社会冲突。为更好地解释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环境威胁与遭遇的环境问题,学界必须重新界定安全概念。环境安全新思考始于 20

收稿日期:2017-04-17; **修订日期:**2017-06-2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委托科研项目“威胁与风险:气候变化对我国内陆省的影响研究”(2017WTKY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建福(1980—),男,山西汾阳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环境政治。

① Ken Conca and Geoffrey D. Dabelko, eds., *Green Planet Blues: Four Decade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4th edition, Westview Press, 2010, pp.1-2.

② Indra De Soysa,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the Resource Curse”, in Floyd Rita and Richard A. Matthew, ed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pproaches and Issues*, Routledge Press, 2013, pp.64-81.

世纪80年代中期。^①冷战结束拓展了环境安全的思维空间、丰富了环境安全的研究路径、完善了环境安全的知识架构。然而,“9·11”事件推动反恐战争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安全议题,环境安全遭到国家忽视而退居二线。反恐战争降温后,气候变化逐渐被提上国际政治议事日程,许多环境安全概念与安全实践的学术争论再次活跃。

20世纪90年代,环境安全研究分裂为两大主题:一是抽象的安全定义,即:安全问题再定义;二是具体的安全威胁,即:环境变革带给个人、国家以及全球公民的安全威胁。迄今为止,学界仍未就这两大问题达成一致,因而环境安全仍然是一个具有多元研究视角、涉及不同论述立场、具有宽泛研究课题且尚未发展为独立学科的研究主题。

一、现实主义安全观及其批判

现实主义安全观历史悠久且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和战后初期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一度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安全理论。国际安全内容随社会发展得到了扩展,因而出现了许多现实主义安全批判。

1.1 传统主义安全之辩

现实主义安全主要研究国家间战争缘起与和平条件。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追求自助政策,导致产生国家间威胁。^②安全被定义为保护国家,并逻辑扩展为保护国界内国民免遭其他所谓国家的威胁,即:国家安全保障就是对其国民安全的保障^③。任何国家都会按照其所谓的国家利益行事,并将军事手段作为保护其国家安全最直接的方式。外交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另一种手段。现实主义认为每个自我界定的国家通常认为自己处于地区或全球安全的困境之中,国际体系的稳定关键依赖权力平衡,国家安全的决定因素是武器性能,重大的安全危机会威胁每个国家,因而,他们的安全主导思想是获取与使用权力。

20世纪70—80年代,现实主义范式的安全

批判研究开始盛行。自由主义承认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却挑战现实主义范式的多边安全逻辑,认为国家安全可以在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主义安全观的内容更宽泛,涉及个人、集体、国家乃至国际体系安全,具有多维特征。自由主义密切关注不同利益观念间和谐共存的途径,努力平衡国家个体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并综合平衡强制与非强制的交往手段。^④他们赞同国际社会不存在最高权威,但可以共享利益、制度、规则与价值观念。所以,国家维护国际安全、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就是变迁国内社会结构、改造国际关系模式、改革政治经济举措并构建共同的道德、伦理与法制。^⑤简言之,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安全研究的起点相同而分歧主要是安全范围及其实现手段。

1.2 结构主义安全观

结构主义超越单一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框架,^⑥避免了现实主义安全忽视政治经济不平等的研究误区。结构主义认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能保证个人或族群摆脱安全困境、免遭安全威胁,因而需要深入研究结构过程与结构要件(如种族、阶级与性别等)才能更好地解释安全问题。^⑦同时,结构主义认为国家或地区融入全

① 可参考: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著,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石斌:“‘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国际政治视角的伦理辨析与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第85—110页。

④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著,吴勇、宋德星译:《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111页。

⑤ 时殷弘:“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83页。

⑥ 有关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参考:[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夏继果、顾宁译:《现代世界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美]斯蒂芬·克雷斯勒著,李小华译:《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 Joel A. Tickner, “Re-visioning Security”,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olicy Press, 1995, pp.175—197.

球体系必然带来安全问题或招致安全威胁。^①世界体系论借鉴依附论基础提出全球资本主义,采用统计学话语密切关注广义国际体系的结构过程,^②并将国家划分为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③比约恩·赫特纳(Björn Hettne)对世界新秩序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将国际社会划分为“核心—中间—外围”结构^④。在此,边缘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安全都会受到核心国家的影响。

现实主义安全研究与世界强国的战略利益紧密相连,安全问题的实质是安全政策直接服务小众国家而危害大众国家。后结构主义属于安全批判研究,主要包括发展研究、生态政治、环境政治、女权主义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主流批判理论。他们认为现实主义安全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权力附庸。^⑤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虽具开放性特征,但大多处于萌芽状态尚未对安全概念形成统一认知。^⑥他们认为环境恶化对人类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并成为国际冲突的潜在或间接诱因,这就拓展了威胁内容,涵盖了更多的安全主体。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突出强调“话语”“认同”等范畴在安全中的特定作用,并赋予威胁自我的他者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法理依据就是任何物质都无法离开话语表征而独立存在。^⑦

1.3 现代主义安全观

现代主义强调人类理性的自然特征,承认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正当权利,他们的核心观念虽然是文明进步,却特别关注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等现实环境问题,并将这些环境问题作为他们的分析逻辑。现代主义认为技术进步带来正反两方面社会效应,为少数人创造财富、带来发明、添加乐趣、增加选择,却给大多数人造成贫困、产生垃圾、限制选择,同时也给全人类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环境问题。技术进步及其负效应成因果整体、联系密切,因而任何对科技的褒扬都不能掩盖其带来的众多环境问题。

约翰·贝内特(John Barnett)、西蒙·多尔

比(Simon Dalby)等学者认为科技发展并非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更有马修·帕特森(Matthew Paterson)、约翰·巴里(John Barry)、罗宾·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等激进派认为,国家没必要进行环境治理,甚至没必要积极保护环境。^⑧现代主义强调结构制度时的重要关切点仍然是国家安全。“安全研究”作为强国附庸具有几大特征,虽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仍需特别强调:政治可能性(国内秩序的可能性)、威胁外围性(国际无政府状态威胁)、威胁识别与解决措施(客观现实的理性认知)、实践基础上的安全理论构建(旨在实现准确认知客观真理)、对非理性行为体的强力回应(保护无政府状态下的弱国和女性)。现代主义还可以避免实证主义研究误区,因为实证主义可能对科技知识产生认知偏颇,进而可能提出错误问题,或对正确问题进行错误建构,并阻碍对环境恶化

① Larry A. Swatuk, “Southern Africa through Green Lenses”, in Peter Vale, Larry A. Swatuk and Bertil Oden, eds., *Theory, Change and Southern Africa's Futur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1, pp.266–293.

② 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126页。

③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夏继果、顾宁译:《现代世界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④ 关于“核心—中间—外围”结构可参考:郑先武:“安全区域主义:一种批判 IPE 分析视角——比约恩·赫特纳‘新区域主义方法’述评”,《欧洲研究》,2005年第2期,第27–44页;Björn Hettne,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in Peter Vale, Larry A. Swatuk and Bertil Oden, eds., *Theory, Change and Southern Africa's Futur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1, pp.83–110;Björn Hett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Björn Hettne, André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9, pp.1–24.

⑤ R. B. J. Walker, “The Subject of Security”, in Keith B.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62.

⑥ Michael C. Williams, “Words, Images, Enemies: Securi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4, 2003, pp.511–531.

⑦ 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16页。

⑧ 张海滨著:《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Matthew Paterson, *Understand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5, p.18.

原因的多维理性认知。^①

学者们渴望全面理解气候变化、森林砍伐、渔业衰竭等环境安全问题,并客观认识这些安全问题对社会稳定与国际秩序的影响,努力寻找减少安全隐患、管控安全威胁的有效途径。但安全问题原因众多,说辞不一。现实主义坚持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认为安全问题源自群体未开化、内部文明秩序未建立,因此安全措施就是驯化群体、建立秩序。然而,大部分批判主义者认为环境安全问题有其成立的特殊条件。后现代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现代国家体系下工业资本发展、科学技术革新、军事工业创新、个人自由扩大、消费观念盛行等多重原因所致,同时体现政治统治的专权性与复杂性,^②因此,安全措施就是本质重构现代社会。总之,安全概念的学术争论持续不断,安全问题需要进行层次论证。

二、环境安全问题解决理论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后,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等人就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进行过论证。虽然众多历史案例可以佐证环境日益恶化,但直到1987年“环境安全”这一概念才被联合国首次使用。到20世纪90年代,安全研究学者才将环境与安全联系起来并提出政治学上的“环境安全”,即承认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与暴力冲突存在联系。很多学者尝试对环境安全研究进行文献整理与回顾综述。其中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环境变化与安全项目年报”就成为环境安全研究领域的重要索引,因为这一年报具有实际参考价值与重要的指导意义。^③也有学者分析环境问题导致国际冲突的可能性,论述环境问题与国际冲突的历史延续性、整体性及影响范围等。

环境安全理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问题解决理论,进行范式内争论,主要关注研究范围、概念定义、方法论以及数据收集,预期达到积累环境安全相关知识、进行政策建议的研究目的。第二类是批判理论,进行范式间争论。批判理

论确定特定的研究范围,采取独特的研究方法,尤其关注解决问题的具体参与者,并就本体论与认识论提出质疑。他们的核心关切与现实主义安全研究类似但质疑问题解决理论的假定。他们认为全球安全是一种自我界定,强调更强大的政治、军事、技术权力与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一类属于中间派,普遍是新制度主义与生态政治主义。^④他们坚持后建构主义立场,关注个人或生态系统的认识论视角,并努力为国家或国际机构谏言献策。

2.1 环境安全研究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权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其主权领土范围内控制的自然资源,^⑤也取决于国家获取这些核心资源的能力。后工业时代,国家权力包括国家将可再生资源与非可再生资源转化为可用于消费的贸易资源的能力。因此,国家权力不会因自然资源枯竭而消失,反而会因其转化而增强。

冷战结束意味着西方国家必须重新建构对军事力量的认知,改变军事力量的功能与作用,有人担心西方国家会真正进入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于是,人们提出这样的疑问:“未来威胁将源自何处?”然而,环境破坏、资源枯竭推动国家努力保护岛屿、大陆架、原料产地,迈克尔·克拉雷(Michael Klare)因此提出争夺控制核心资源已成为21世纪各国军事行动的重要指导原则。^⑥当前世界环境安全问题不断见诸报纸杂志,已为普通民众所接受。罗伯特·卡

① Spike V. Peterson, *A Critical Rewriting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grating Reproductive, Productive and Virtual Economies*, Routledge Press, 2003, p.39.

② Simon Dalb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Polity Press, 2009, p.109.

③ 有关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环境变化与安全”项目可参考网站: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rogram/environmental-change-and-security-program>.

④ 这类环境安全理论并非本文的论述重点,因而不进行阐述。

⑤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 Michael T. Klare,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1, p.44.

普兰 1994 年为《大西洋月刊》撰写题为《无政府时代的来临》的文章,详细论述了环境冲突,在政策圈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环境安全与战争、贫困联系紧密,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尤以非洲国家最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曾公开表示,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受环境退化驱动。^① 过去 20 年来重大的全球峰会中,有关人类行为对环境影响的全球峰会规模日渐增大、数量逐渐增多,各国政府已经开始逐渐将安全逻辑转向环境的潜在威胁。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许多系统研究开始检验环境与冲突关系的各种假定。

2.2 环境安全视角一:资源枯竭

发达国家系统研究环境安全中最著名的案例当属霍默-狄克逊(Homer-Dixon)主持的研究课题《人口、环境与安全》和《环境变革与安全》。霍默-狄克逊认为若将土地、森林、水源、渔业等可再生资源消耗与暴力冲突间的因果关系作为研究焦点,我们会很自然地将论证重点转向大规模环境变化的社会效应,如全球变暖、臭氧空洞带来的社会问题。^② 当然,研究者首先应解答资源与冲突间的关系问题:资源枯竭是否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暴力冲突?若是肯定答案,那么暴力冲突的方式如何?^③

资源枯竭可能由于环境自身原因所致,也可能是社会原因所致,具体表现为:①农田腐蚀等环境问题造成资源供应减少;②人口增长或人均资源消耗增加导致能源需求总量增加;③资源占有或分配不均,即资源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造成大部分人面临资源紧缺。^④ 第三条假定可以扩展为:少部分技术先进或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占有资源,而大部分人因资金匮乏或技术缺失处于生态资源边缘,没机会享受资源带来的便捷与好处。资源绝对供应、资源相对供应与资源社会分配是环境学者的研究焦点,也正是新马尔萨斯环境冲突论的基础模式。

环境安全研究在分析资源枯竭与冲突关系时基于三大核心假定:①受自然条件限制的淡水与农业用地等资源供应日益紧张可能导致简

单的资源冲突;②资源枯竭的环境压力使人口大规模迁徙可能导致族群认同危机;③严重的资源枯竭可能增加经济掠夺、加大冲突强度,甚至冲击国家核心的社会制度。基于以上三条假定,霍默-狄克逊研究发现:资源枯竭导致国家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降低,造成社会需求绝对或相对增加,而且会产生极端复杂的生态政治效应。但资源枯竭与社会断层、暴力冲突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也不存在直接联系或单线联系,资源枯竭本身更非暴力冲突的充分条件。^⑤ 资源枯竭引发环境变革与暴力冲突涉及国内众多相互关联的政治经济因素,只有将资源枯竭置于其所处的、独一无二的社会背景中,综合分析资源枯竭与其他政治、经济、社会因素,^⑥ 我们才能得出资源枯竭与社会冲突间全面客观的联系。

2.3 环境安全视角二:发展畸形

环境变革具有复杂的社会背景,是发展畸形、发展转型与发展冲突单独或相互作用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发展变革面临的重大问题是过度依赖能源生产与出口,造成产业发展不均衡,严重影响他们扩大再生产并应承受巨大的压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畸形会引发不同强度、不同特征的社会冲突。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经常会面临发展畸形,原因是他们民族成分复杂,由一个主导民族统治,并由它对核心资源进行

①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Sudan: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Nairobi, 2007, http://postconflict.unep.ch/publications/UNEP_Sudan.pdf.

② Ken Conca and Geoffrey D. Dabelko, eds., *Green Planet Blu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from Stockholm to Kyoto*, 2nd edition, Westview Press, 1998, p.289.

③ Thomas F. Homer-Dixon, "Environmental Scarcities and Violent Conflict: Evidence from Cases" (abridged version), in Ken Conca and Geoffrey D. Dabelko, eds., *Green Planet Blues*, Lynne Rienner Press, 1998, pp.287-297.

④ 同③。

⑤ Thomas F. Homer-Dixon, *The Environment, Scarcity and Viol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78, 281.

⑥ Alexander Carius and Kerstin Imbusch,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in Alexander Carius and Kurt M. Lietzmann, ed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1999, p.20.

社会福利分配,这样很容易造成分配不均进而引发社会冲突。^①环境冲突的因果链较长,可能源自破坏环境的发展畸形。

发展畸形既有历史原因,也与当代国际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发展畸形与社会冲突的关联需要提及五点^②:①实证缺失:发展畸形导致暴力冲突与战争的假定缺乏实证依据;②原因视角:政治原因大于环境问题;③经济社会影响:发展畸形增加经济掠夺,并可能导致核心社会制度崩溃;④解决途径:发展环境问题推动国家合作,政治妥协才是灵活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⑤后续影响:发展畸形带来资源枯竭并导致人口大规模迁徙,继而造成冲突。

发展畸形是国家或市场侧重发展某一行业或某些行业,致使其他行业发展缓慢或停滞。“荷兰病”(Dutch Disease)是用来形容这种发展模式的重要术语。由柯登(W. M. Corden)和彼得·尼利(Peter J. Neary)提出的“荷兰病”主要指某国经济的某一初级产业部门异常繁荣,并带来暂时性出口剧增、货币升值、国际收支顺差等经济繁荣景象,同时其他产业部门出现衰落,国家最终遭遇通货膨胀、产业失调、收入下降、失业激增等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出现社会动荡与暴力冲突等安全问题。资源过度依赖带来的发展畸形会降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与解决冲突的能力,^③为地主领主、流氓恶霸和军事官员挑衅政府提供机会,^④致使社会冲突升级甚至发展为内战。^⑤资源依赖型发展畸形会使资源储存区民众得到更大的经济刺激,中央政府的倾斜政策加剧资源移民,资源进口国的贿赂或经济资助也会强化国内冲突,这些都会提升域内外对立程度、加大冲突的可能性,甚至引发国家分裂。发展畸形会造成民众的嫉妒心理,使邪恶势力通过敲诈勒索或绑架员工,加剧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紧张局势,更糟的情况是诱发社会冲突甚至内战。

李峰与吴海霞在论述发展畸形问题时就使用“荷兰病”分析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特征。^⑥尼日利亚出口与财政过度依赖尼日尔三角洲的石油能源,石油公司攫取了很高的能源利润,却

降低了收益返还比例,从1970年约50%降至近年规定的13%,实际支付比例则更低,仅为3%。民众赤贫导致极端组织兴起,解放尼日尔三角洲运动与三角洲人民志愿军活动猖獗,匪徒横行并偷盗油料、袭击油田、绑架工人、破坏输油管线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⑦,而且极端组织社会活动猖獗也带来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大部分国家中心论者断言,发展畸形会增加发展中国家冲突的可能性,这些冲突存在物理规模与速度特征上的差异,可能是人际冲突、社区冲突、国内冲突、也可能是国际冲突。此外,发展中国家发展畸形也会给发达国家造成安全隐患。

2.4 环境安全视角三:气候变化

随着气候变化提上国际政治议事日程,环境安全研究的重要基石逐渐固定在霍默-狄克逊的研究结论上,即:气候变化给可再生资源生产带来问题,增加了安全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起暴力冲突。^⑧美国2014年《气候变化行动报告》证实:理解冲突威胁可以降低脆弱性,美

①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56, No.4, 2004, pp.563-595.

② Günther Baechler,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 Causes Violence: A Synthesi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No.4, 1998, pp.24-44.

③ Ian Bannon and Paul Collier, eds., *Natural Resources and Violent Conflict: Options and Actions*, World Bank, 2003, p.25.

④ See: William Reno, *Corruption and State Politics in Sierra Leo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30-154; William Reno, *Warlord Politics and African States*, Lynne Rienner, 1998, p.29; Marta Reynal-Querol, "Ethnicity, Political Systems,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6, No.1, 2002, pp.29-54.

⑤ See: Hazem Beblawi, "The Rentier State in the Arab World", in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Croom Helm, 1987, pp.49-62;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1, 2003, pp.75-90.

⑥ 李峰、吴海霞:“尼日利亚经济增长机制和问题研究——基于荷兰病理论的分析”,《世界地理研究》,2015年第3期,第42-49页。

⑦ Annegret Mhler, "Nigeria: A Prime Example of the Resource Curse? Revisiting the Oil-violence Linking the Niger Delta", *GIGA Working Paper*, 2010, p.16.

⑧ Thomas F. Homer-Dixon, *The Environment, Scarcity and Viol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1.

国正在准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以确保环境安全。^①

实际上,早在1996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将气候变化表述为“大规模环境恶化破坏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②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公布的评估报告称:气候变化加剧资源的稀缺性,可能导致国家间争夺资源的冲突。^③同年,赢得总统大选的奥巴马也宣称“气候变化事关国家安全”。奥巴马执政后于2010年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气候变化威胁地区安全,也会威胁美国人民的健康与人生安全,^④是真实、严重且紧迫的威胁,应当制定并执行明确具体且具可操作性的气候变化政策。^⑤联合国安理会也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指出气候变化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应该受到全世界人民关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不到半年便退出了《巴黎协定》,这无疑会严重影响民众和学者对气候变化的安全认知。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议题不会因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而遭到忽视,国际社会反而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感到惋惜,因为这是对气候变化安全认知的一种践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特朗普政府“退约”的理由是《巴黎协定》将给美国带来“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⑥这也可以侧面反映特朗普政府并非完全否定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联系。

气候变化与人类安全、社会稳定存在多重联系路径与反馈模式。^⑦气候变化引发的环境安全具有三大脆弱性:①受气候变化影响: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脆弱国影响最大;②对气候变化敏感:气候变化可能像可再生资源一样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③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差:全球变暖可能超过国家的适应能力,国家应从社会体系与自然体系两个角度进行政策回应,否则会引起社会动荡,导致冲突升级甚至引发暴力事件。

欧盟议会2008年准备会议的报告材料对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进行了如下总结:气候变化将会破坏沿海城市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岛

屿消失使国家领土遭受损失进而引发边界争端与环境移民,加剧受影响国家对淡水、粮食等生存必备资源的争夺。^⑧所罗门·西昂(Solomom M. Hsiang)等人对60多个案例进行了详尽的数据量化分析,理性推演了环境恶化与暴力冲突间的因果联系,有力论证了气候变化作为环境变量对暴力冲突与社会动荡的影响,做出如下合理的总结:持续数十年到数千年不等的气候异常会导致人为暴力、犯罪事件、族群斗争、政治动乱甚至制度垮台等形式各异的人类冲突。^⑨

所罗门·西昂的上述结论基于气候变化与冲突机制的相关假定。经济假定:若气候事件降低经济效率,参与冲突相对参与正常经济活动的价值可能提升。政治假定:气候事件降低经济效率,政府制度力量会遭到削弱,即政府镇压暴动与压制犯罪的能力降低。认知假定:气候异常或加大民众的安全认知困难,或导致民众安全认知归因错误,或改变社会安全认知机制,从而改变人类的冲突逻辑、影响冲突模式。社会假定:①若气候事件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或/和经济发展不对称,社会就会呼吁进行财产再分配,进而增加冲突数量;②若气候事件导致人口大规模迁移或城市化进程加速,那么人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Climate Action Report 2014*, 2014, <https://www.hsdl.org/?view&did=750308>.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1996*, 1996,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996/>.

③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8, <http://fas.org/irp/nic/2025.pdf>, p. xi.

④ 刘长敏、李贵州:“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比较研究”,《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6期,第54-62页。

⑤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nssarchive.us/NSSR/2010.pdf>, p.8.

⑥ 赵灵敏:“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吗?”《华夏时报》,2017年6月8日。

⑦ Jürgen Scheffran, Michael Brzoska, Jasmin Kominek, Michael P. Link and Janpeter Schilling, “Climate Change and Violent Conflict”, *Science*, Vol.336, No.6083, 2012, pp.869-871.

⑧ “Report to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4, No.3, pp.587-593.

⑨ Solomom M. Hsiang, Marshall Burke and Edward Miguel, “Quantifying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on Human Conflict”, *Science*, Vol.341, No.6151, 2013, pp.1190-1212.

口集中致使地下资源相对减少,容易诱发争夺资源的冲突。

气候变化并非导致冲突的唯一因素,甚至不能说是主要因素,但气候变化与冲突间确实存在实质性联系。^① 气候变化与冲突威胁的关联性可以通过分析三个变量来评估,即:地理暴露度、社会危害度与经济适应度。^② 通过分析这三个变量我们能够深刻了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风险。然而,学者们仍需首先对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归因达成共识,若认可其系人类行为所致,应思考哪些阻止措施更有效;若对这种因果联系持怀疑态度,学者们还应找到气候变化与冲突间的联系路径。

2.5 环境安全视角四:环境安全治理

国家类型不同发生环境冲突的比率不同^③:民主代表制国家能够很好地反映平民的社会需求,而专制国家则不具备这种制度优势,同时两类国家对社会需求也有不同的应对措施。这样两类国家面临环境冲突的频度和强度都会存在差异。经济贫困的国家普遍存在种族较多、财政匮乏、技术落后与人力资本较差等问题,因而环境适应能力较弱,难以应对严重的环境挑战。霍默-狄克逊等人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出南非、墨西哥、菲律宾、卢旺达、巴基斯坦属于环境适应能力缺失的国家。^④ 这些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国家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并成为国际环境政治的研究重点。

环境和平属于环境安全研究范畴,是指将环境冲突所涉各党派团体聚集起来通过某些措施缓解政治紧张局势、建立政治互信关系、共同解决环境安全问题。^⑤ 实现环境和平合作的途径有两条:改变国家环境战略与建构后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机制。美国通过发展生物燃料以增强其软实力,毕竟生物燃料比传统燃料(汽油和柴油等)更清洁,有利于缓解气候变化。^⑥ 美国政府还制定标准、颁布法律、进行规划,如清洁电力计划、清洁能源计划、气候行动计划等来实现气候缓解战略。欧盟国家认识到低碳技术将决定国家未来的经济竞争力,因而要求各成员

国尽快完善低碳工业体系,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并提出了一系列低碳发展战略。其中著名的战略有:里斯本战略、欧盟2020战略和欧盟2050战略。欧盟2020战略明确提出了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五大目标、三大优先领域和七大重点计划。^⑦ 欧盟2050战略明确了减排战略的具体目标,如:欧盟计划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5%到90%,从而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⑧

俄罗斯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也积极发展核能、可再生能源和水电,并加大这些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日本为缓解气候变化同时确保能源供应,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进行能源技术革新努力实现减排增效并加以推广。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安全威胁,东盟采取开放的态度对待所有参与主体,鼓励各地方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威胁。^⑨

国家建构后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机制依赖国际协议与国际合作,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些

① Solomom M. Hsiang and Daiju Narita, "Adaptation to Cyclone Risk: Evidence from the Global Cross-section", *Climate Change Economics*, Vol.3, No.2, 2012, p.12.

②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2014: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第二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日内瓦, http://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5/wg2/ar5_wgII_spm_en.pdf, 第5页。

③ 张海滨著:《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④ Thomas F. Homer-Dixon and Jessica Blitt, eds., *Ecoviolence: Links among Environment, Population and Securit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p.8.

⑤ 潘敏、徐理灵:“中美北极合作:制度、领域和方式”,《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2期,第87-94页。

⑥ Green Car Congress, *Study Finds Current Swedish Biofuels Offer Major Climate Benefits: Biogas from Manure the Best*, May. 25, 2010, <http://www.greencarcongress.com/2010/05/lund-20100525.html>.

⑦ 张永宏、梁益坚、王涛著:《中非低碳发展合作的战略背景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9页。

⑧ 尚军:“欧盟委员会出台2050年减排规划”,新华网,2011年3月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3/09/c_121166542.htm.

⑨ ASEAN Secretariat, 2009 *Blueprint on the 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Mar. 14, 2009, <http://cil.nus.edu.sg/rp/pdf/2009%20Blueprint%20on%20the%20ASEAN%20Socio-Cultural%20Community.pdf>.

协议与合作模式以便其他国家学习。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被认为是国际环境机制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环境机制发展的新时期。在这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21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文件和条约。这些文件和条约提升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高度,阐述了有关环境与发展原则问题,提出了国际环境机制的重要原则,明确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责任。^①以气候变化治理为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的历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都会通过新的宣言和声明进一步完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并逐步为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和国际制度奠定法律基础。

当然,资源不同环境合作方式不同,合作的引导性与吸引力也就不同。^②本世纪初,国际环境安全开始实现研究转向,学者们从对冲突诱因的热情转向环境冲突的合作解决策略与实现和平的方法路径。^③区域冲突较易通过合作方式解决,但区域冲突无限升级并不断增强,那么合作方式就无济于事。环境压力既是冲突升级的结构性根源,也是冲突升级的无限动力,发挥着催化剂或导火索的作用。为避免环境压力招致暴力冲突,国家必须确保早期预警机制、数据收集与辅助决策机制切实可行且具保障性。发展若依赖自然资源,那么发展畸形、治理失误或制度缺失可能会加剧这种依赖,进而引发环境冲突。因此,解决暴力冲突很大程度上应凭借有效的政策体制,需要全球治理。^④

2.6 小结

以上分析主要涉及环境安全问题解决理论的重要研究视角,对环境安全问题的主要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而且兼顾了发达国家的环境安全治理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安全问题,对全面提升国际环境安全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谈论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发展中国家,不能体现环境安全的全面性。资源枯竭与发展畸

形主要论述的是发展中国家,而实际上,发达国家也出现资源枯竭问题,只是他们可以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源来满足本国的发展需要。换句话说:发达国家资源枯竭带来的安全问题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是环境安全问题的转移而不是没有环境安全问题或者有效解决了环境安全问题。通过国际贸易解决资源枯竭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对于资源出口国而言,资源枯竭也将成为必然,这种认知缺乏一种国际主义视野,因而资源枯竭必须用超国家视角和全球视角进行思考。

发展畸形也更多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实际上,“荷兰病”这个术语本身源自发达国家,只是发达国家可以迅速找到治愈“荷兰病”的方法,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技术水平较差,金融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很难有效治愈“荷兰病”,这样才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冲突甚至分裂。气候变化引发的安全问题在当前世界最受关注,而且这一安全隐患的最大受害者首先是处于地缘劣势的国家,如小岛屿国家。这些国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遭遇国家灭亡。

环境安全问题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视角,即危险品跨境。这一安全问题是发达国家将环境危险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并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最终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安全隐患,因而受害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环境安全治理中提到的治理方法是最行之有效的环境安全解决策略,这既要求个体国家进行全面的安全机制改革,降低环境安全事件的发生概率,保证国家

① 张海滨著:《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222页。

② 王婉璐:“南极治理机制的类型分析”,《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2期,第77-86页。

③ Shlomi Dinar, ed., *Beyond Resource Wars: Scarcity,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T Press, 2011, p.3.

④ Indra De Soysa,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the Resource Curse”, in Rita Floyd and Richard A. Matthew, ed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pproaches and Issues*, Routledge Press, 2013, pp.64-81.

能够应对环境安全威胁。同时国际社会也应进行全面合作,通过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保证环境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环境安全需要全面深入地从事跨国维度和超国家视角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有效地解决国际环境安全问题。

三、环境安全批判研究

自环境问题登上国家安全研究版图之日起,环境安全的批判研究便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提出质疑:环境问题与安全研究何以建立联系?丹尼尔·杜德尼(Dannel Deudney)打响了环境安全批判研究的第一枪,他的文章至今仍然是环境安全批判研究的理论基础^①。迄今为止,著名的环境安全批判学者有马里恩·利维(Marion Levy)、西蒙·多尔比、尼尔斯·彼得·格拉迪施(Nils Petter Gleditsch)、南希·彼罗素(Nancy L. Peluso)、梅雷迪斯·瓦茨(Meredith W. Watts)、约翰·贝内特、理查德·马修(Richard Matthew)等。环境安全批判研究对传统安全提出三方面质疑。

第一,国家安全通过暴力实现,具有组织性、系统性、秘密性、技术含量高等特征。而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环境安全却应通过国际合作,具有公开性与创造性。解决地区层面或/和全球层面的环境问题不能依赖国家安全部门,而应通过国家科技、经济、人文交流等部门进行合作。

第二,国家安全语境不仅适用于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威胁,也适用于国界外的人、事、物以及公地的潜在环境威胁。国家只要认为出现潜在的环境威胁,就可立即为环境问题贴上国家安全标签,无需进行环境意识再宣传即可毫不犹豫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干涉。这种论调充满疑问。

第三,世界各国在其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后会陷入冲突状态。实际上,全球贸易体系、自然资源替代能源、科学技术变迁以及绝对相互依赖的发展可以保证资源充足供给。^②同时,环境破坏的影响范围超越国界,并可能带来环境安全问题。解决这种环境冲突日趋复杂且杂乱无章,但无论如何这种冲突不致引发战争。^③

3.1 批判议题一:国家问题

国家作为重要的权力构成要素与核心的权力行使者是环境安全批判研究的重要议题。环境政治学者将安全概念扩展到环境领域后,尽管突破了传统权力结构与权力网络的分析框架,综合了环境政治的学科特点,从生态哲学、环境问题、人文地理、人类发展、女权主义等视角分析环境安全问题,但国家仍然是各研究视角不可回避的重要研究主题。环境安全批判研究以国家为研究中心,采用传统研究方法,分析环境政治的时空变化,并提出全新的环境安全概念。环境安全批判研究特别关注国家主导体制下现代工业文明产生的负效应,而且他们坚持的世界观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坚持的世界观存在显著区别。

环境安全远远超出了传统安全的研究范畴,需要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历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全面的专业知识,只有这些专业学者一道努力才能打开环境安全研究这扇大门。^④环境安全研究对国家的重视程度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因为国家的组织形式会随时代推演发生更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会随国际局势的变革而起伏跌宕。约翰·贝内特、尼尔·阿杰(Neil W. Adger)、理查德·马修等学者认为环境安全研究实质上是对个人、群体、整个人类乃至生物圈的安全研究。在环境安全研究过程中,史蒂夫·洛内甘(Steve Lonergan)、约翰·贝内特、理查德·马修、拉里·斯瓦特珂主张“去国家中心化(decenter)”,而有的学者则相反,罗宾·艾克斯利就认为环境安全研究仍

① Dannel Deudney, "The Case against Link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Millennium*, Vol.19, No.3, 1990, pp.461-476.

② 郭剑雄:“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内生增长:工业化与农业发展关系再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77-87页。

③ Ken Conca and Geoffrey D. Dabelko, eds., *Green Planet Blu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from Stockholm to Kyoto*, 2nd edition, Westview Press, 1998, pp.310-312.

④ Richard A. Matthew, "In Defense of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Research",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No.8, 2002, pp.109-124.

应以国家为研究中心,并朝着国家环保的方向展开思考。^①因此,环境安全研究不容忽视的分析单元仍然是国家。

环境安全批判研究清楚点明环境安全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术领地,应像其他政治问题一样以平常心对待。环境政治中的安全研究仅仅是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环境历史学等学科的一个研究视角,因而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在环境政治研究过程中主要关注现代国家致使研究框架比较片面,很难全面深刻地解答重大的环境安全问题。例如:西蒙·多尔比鼓励学者与读者特别关注国际环境政治变革过程中的现代化进程。他认为帝国主义工业带给全球深刻的社会变革与生态变革,让人类实现了对全世界的征服,但也使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资源匮乏。

政治学者、安全专家以及政策精英将他们认同的制度与实践视为正统的、颠扑不破的自然逻辑。环境安全批判研究以挑战这种自然逻辑作为破题起点旨在强化其说服力。以生态学者为例,他们认为环境安全就是保护环境健康,即:保护特定生态系统的安全,进而扩展到人类安全,以及更高层次的地球生物圈的安全。^②为确保环境安全治理措施切实有效,专家学者必须全面深刻地认识安全概念。环境安全作为人与自然的互动模式与互动结果仍然是国家安全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要求最低限度的国际治理。^③

环境安全批判者也需认识到国家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国家缔造者与当权者手中。亚历山大·温特(Wendt E. Alexander)曾提出,谁导致无政府状态,谁就应该制定规则、恢复秩序。^④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具有强大的运作能力,可能使国际社会变得更加残酷。基于此,环境安全批判学者开始关注现代化给国家带来的负效应,重点研究国家以“秩序”和“稳定”为幌子采取的政策行动。他们还关注国家以外的集体行为体,将国家与其他安全行为体对立起来,提出“二元对立”论,即:要实现环境安全就要消灭国家。^⑤环境安全批判者的指责无所不在,即使那

些自诩为开明的国家也未能幸免,同时,环境安全研究开始与共同话语背道而驰,越发朝着多元化发展。

3.2 批判议题二:安全认知新话语

现代社会语境下关注人类安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强化权力认知。南希·彼罗素、梅雷迪斯·瓦茨、马修·施努尔(Matthew A. Schnurr)、拉里·斯瓦特珂等批判学者认为,当前研究所需的仅是一种能够表达歧义并挑战全球政治秩序的确当话语。^⑥结构主义批判理论认为环境议题应转化为政治话语,并以合法话语进入权力分配的组织关系与社会关系之中。^⑦环境政治话语凭借的知识体系不同,建构的环境话语认知体系也不同,这样同一社会现实就出现不同的解释与判断,^⑧国家也会因此采取不同的环境应对策略。环境政治行为体在国际互动中可以利用语言武器宣传自己的身份的同时影响别人的意识建构。语言作为推动国际关系变化的动力具有强大的功能,因而,语言建构的国际身份与物质权力建构的国际身份具有相似的说服力。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政治研究出现语言

① Robyn Eckersley, "The Big Chill: The WTO and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4 No.2, 2004, pp.24-50.

② Peter Stoett, "What Are We Really Looking For? From Eco-violence to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 Matthew A. Schnurr and Larry A. Swatuk, eds., *Environmental Change, Na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Conflict*,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2, pp.15-32.

③ Nancy L. Peluso and Michael J. Watts, "Violent Environments: Response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No.9, 2003, pp.89-96.

④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 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21页。

⑥ See: Nancy L. Peluso and Michael J. Watts, eds., *Violent Environment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83-115; Matthew A. Schnurr and Larry A. Swatuk, eds., *Environmental Change, Na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Conflict*,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2, pp.15-32.

⑦ 沈承诚:“论环境话语权力的运行机理及场域”,《学术界》,2014年第8期,第85-94页。

⑧ 同④,第16页。

学转向 (linguistic turn)。^① 这一研究转向推动话语因素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在国际政治学者看来,话语是一种权力表现,话语运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行为体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选择确当的话语用于解释表象,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强自身话语权,另一方面可以用这种权力影响其他行为体进而维护自身利益。后建构主义理论就以此作为分析起点。现实主义使用物质力量展示权力,后建构主义则通过语言实现权力。^② 后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秩序并非无政府状态的逻辑结果,而是施动者在语言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社会建构。

话语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不具中立性,是安全认知研究的关键。^③ 掌握发展、安全与环境等专业知识的特定人群在使用话语时深入考究、力求独特,目的是挑战世界秩序的常规思考模式与思考方法。可持续发展、环境安全等研究术语被学者们赋予了多重涵义,其宗旨就是确保不同组别的人群可以持续进行探讨。同时,有些独特的术语在特定语境下表述含混,但确保了占主导地位的人群能够维持他们的核心地位,保持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模式,环境政治的部分参与者自然而然也就丧失了公平对话的权利。

国际环境政治为描述环境现实诞生了许多流行术语,这些流行术语成为环境安全批判研究的重大表现。沃伦·马格努森 (Warren Magnusson) 将世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城市政治” (urban politics)。^④ 随后,马达夫·卡吉尔 (Madhav Gadgil) 和拉玛昌德拉·古哈 (Ramachandra Guha) 鼓励人们从全球层面思考资源利用,并将人类置于生物圈与生态系统进行分析。环境安全领域产生的新术语有:“生态阴影 (ecological shadow)”^⑤ (描述发达国家为满足高消费从别国或全球公域获取资源却造成全球环境破坏)、“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表达个人、单位、国家以及人类行为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生态足迹”^⑥ (ecological footprint) (衡量人类行为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都努力创造并使用全新语言或创意语言以便更好地表达各自对环境安全的关切。

环境安全批判注重历史研究的整体性,批判线性历史分析的传统路径,即批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政治历史进程的二元解释线路。传统环境安全研究以美国为原型旨在保证国家体系稳定,而今环境政治超越传统国界,已不能用国家视角进行国际政治思维,而应从生态政治 (ecopolitics) 角度进行全球空间考量。

新世纪,环境安全批判研究开始用“人类纪”^⑦ (Anthropocene) 描述当前环境现实,即人类行为对地球系统产生了直接影响。普遍认为工业革命是人类纪的根本原凶,但反对者认为人类纪的影响应追溯到定居农业初期或者复杂文明出现之时。

3.3 批判议题三:气候变化安全

2015 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创造历史新高,全面突破 400ppm 关口。^⑧ 科学界宣称,地球正在经历每百年大约 2℃ 的升温,人类因此将可能

① 孙吉胜:“语言、身份与国际秩序: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5 期,第 30 页。

② Janice Bially Mattern, *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y, Crisis, 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 Routledge Press, 2005, pp.24, 250.

③ Spike V. Peterson, *A Critical Rewriting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grating Reproductive, Productive and Virtual Economies*, Routledge Press, 2003, p.41.

④ Warren Magnuss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Global City”, *Millennium*, Vol.23, No.3, 1994, pp.621-645.

⑤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Quarterly*, Vol.35, No.2, 1991, pp.211-239.

⑥ 有关“生态足迹”可以参考:William E. Rees and Mathis Wackernagel, “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Measuring the Natural Capital Requirements of the Human Ecology”, in Ann Mari Jansson, Monica Hammer, Carl Folke and Robert Constanza, eds., *Investing in Natural Capital*, Island Press, 1994, pp.362-390; Mathis Wackernagel and William E. Rees, *Our Ecological Footprint: 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 New Society Press, 1996, p.9; Simon Dalby, *Environmental Secur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⑦ 有关“人类纪”可参考:Paul J. Crutzen, “Geology of Mankind: The Anthropocene”, *Nature*, Vol.415, No.23, 2002, p.23; Johan Rockstrom et al., “Planetary Boundaries: Exploring the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Ecology and Society*, Vol.14, No.2, 2009, pp.411-443.

⑧ “全球去年二氧化碳浓度创新高 全面突破 400ppm 关口”,参考消息网,2016 年 10 月 26 日, <http://science.cankaoxiaoxi.com/bd/20161026/1374832.shtml>。

面临更严重的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以及地球系统变化。暴风飓风、海平面上升、极地冰雪融化、植被破坏等环境变化将直接威胁人类生产生活,同时加大社会体系压力,造成边界争议、资源移民等社会问题。^①此外,气候变化可能给地球系统的发展进程与模式变革带来众多不确定性,并由此给人类生存带来众多不利影响。

气候变化批判研究与气候变化研究几乎同步。批判研究主要从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危害认知以及应对政策三方面展开批判。原因认知:郭开先生运用自然力、碳循环分析全球变暖,认为全球变暖属于正常的气候变化。^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则认为气候变化是自然和人为辐射强迫所致。自然辐射包括太阳辐射和火山气溶胶的变化,而人为辐射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导致化石燃料消耗增多,加大了温室气体排放量。例如:1750年至2010年期间人为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中大约有50%发生在最后的40年间,这一论断在气候变化评估报告(2014)中属于高信度级别。^③

危害认知批判: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水文系统,影响水资源的数量与质量,这一评估属于中等信度。^④因而仅强调发展中国家是主要受害者的论调有失偏颇。事实上,发达国家受到的冲击也很严重。但由于发达国家社会财富充裕、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因而可以缓解气候变暖对他们造成的损害。例如: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增加、洪水频发,严重影响部分地区的饮用水,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实现水源净化,而发展中国家却需依赖大自然的自我净化功能。

应对政策批判也是气候变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京都时代和后京都时代,国家按照发展水平被划分为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全球气候治理也主要按照这种国家划分进行责任与义务的“二元”结构分配,同时执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全球减排模式。到《巴黎协定》时,原有的国家分类法得到修改,国家主要被划分为发达国家、新型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而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发展中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与义务也进行考量,同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⑤《巴黎协定》还修订了全球减排模式,各缔约方根据自身的能力与国情确定国家的自主减排贡献力度和实现形式,并接受五年一次的盘点与评审,这实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为核心的混合治理模式。^⑥

国家中心论在研究气候变化与环境安全时以自我界定的主权国家为研究框架,强调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应在国家框架内执行政策,按照多边协定进行国际协调,目的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这种国家框架是国家采取行动的语境,具体语境包括:遏止政治分歧与激进行为的多边对话;政府智库进行的系统规划;适应气候变化的环境政策与制度的准备和更新。气候变化安全研究作为重要的话语体系强调非传统安全,这促使世界各国按照自己的标准程序建构独特的话语体系,时刻准备迎接国际挑战。^⑦

气候变化批判研究实质上恶化了安全问题,因为批判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更强调适应战略与适应措施,而事实上,我们在人类逐渐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后应不失时机地关注缓解战略。^⑧气候变化背景下,环境安全批判还应强调

①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Security Council Holds First-Ever Debate on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Peace, Security, Hearing over 50 Speaker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News and Media Division, Apr. 17, 2007, <http://www.un.org/press/en/2007/sc9000.doc.htm>.

② 转引自:周珂、宋德新:“气候变化问题之批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1-8页。

③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2014: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第二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日内瓦,第45页。

④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2014综合报告决策者摘要”,日内瓦,第6页。

⑤ 薄燕:“《巴黎协定》坚持的‘共区原则’与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变迁”,《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6年第3期,第243-250页。

⑥ 李慧明:“全球气候治理新变化与中国的气候外交”,《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29-39页。

⑦ Maria Julia Trombetta,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Analysing the Discours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1, No.4, 2009, pp.585-602.

⑧ Simon Dalby, “Afterword: Ecoviolence, Security, Geopolitics”, in Matthew A. Schnurr and Larry A. Swatuk, eds., *Environmental Change, Na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Conflict*,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2, pp.224-230.

环境正义。环境正义认为处理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困难重重且难见成效,因为有些威胁具有结构性原因,如:国家政治构成、经济生产方式与国民消费模式等;有些威胁具有地域特征,如极端事件仅在局部发生而不具有普遍性。世界强国即使以全球安全为行动语境,他们的核心动力仍然是国家利益。

3.4 小结

环境安全批判实质上是对环境政治本体论与认识论进行批判。对国家行为体进行批判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必须肯定国家在国际环境政治谈判中仍然扮演主要角色,任何国际组织或其他国家行为体都不可能代替本国进行环境治理或参加环境谈判。另一方面,国际环境治理中“去国家中心化”只能使发展中国家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而使发达国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国际组织更多地参与国际环境治理将使国际组织成为发达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因此,对国家行为体的批判可能是发达国家别有用心、政治阴谋,当然也不能否定世界各国利用国际组织解决环境问题的真实用意,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去国家中心化”。

环境政治新话语虽有助于深刻表达国际环境安全的现实,但也使国际环境安全研究变得过于狭隘,研究者必须全面深刻地学习新术语才能深入地研究环境安全,这会使研究具有重大局限,不利于全面展开研究。这些新的研究术语也可能使环境安全研究成为部分专业人士的研究专利,相关研究著作将成为只有部分专业人士才能读懂的、晦涩的学术文字。环境安全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有助于形成新的话语体系,重构国际体系,但这种新的国际体系只能对部分国家发挥作用,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的约束,却对发达国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例如,美国总统小布什能够退出《京都议定书》,特朗普也能退出《巴黎协定》,这样即使形成了新的话语体系也不会对世界最强国造成任何束缚。

对全球变暖的批判确实很有说服力。从原因认知讲,气候变化或许是自然的内部过程,或

许是外部强迫,如太阳周期改变、火山喷发等,或许是持续人为活动的影响。因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条即将气候变化定义为:自然气候变率之外的直接或间接归因于人类活动而改变全球大气成分所导致的气候变化。^①对危害认知的批判也值得学者深思,传统的危害认知对发达国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当前过多强调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特别重视对小岛屿国家的影响,但这些主要是由自然禀赋所致。对发达国家而言,他们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与自然禀赋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克服这些不利影响。就应对政策而言,无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协调,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的正义立场都受国家利益影响。自上而下也好,自下而上也罢,国家利益必然是气候变化谈判中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也与前面所提到的“去国家中心化”相矛盾。

四、研究展望

环境安全地图相当复杂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即使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制订明确的问题解决框架、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也仅能够解决部分地区的环境问题。到底哪些因素会增加环境安全的复杂性?何种研究路径会强化环境安全认知?何种手段能够实现公正合理的资源配置,保证可持续发展并避免环境冲突?国家治理环境冲突的思路能否避免“零和博弈”的悲剧?迄今为止,这些问题还未得出清晰的答案,因为视角不同采取的研究路径也不同,所提出的解答也就存在差异。

未来环境安全研究趋势较为复杂。虽然有些问题仍然争议不断,但也有很多问题基本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环境变革虽非暴力冲突的主要根源,但却是结构性原因中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复杂的环境变革、环境治理难度更大,更易导致暴力冲突,但也不排除

^①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2014: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第二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日内瓦,第5页。

治理过程中实现和平与合作。气候异常也会带来安全问题,导致小到人际、大到国际的多层次冲突。环境安全还涉及不容忽视的转型困境,即: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那些由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过渡的国家可能表现出更多的脆弱性。

国际社会对环境安全问题的解决策略还未达成一致,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理论上还未找到有效的理论框架。只有确当的理论框架才能很好地帮助学者理解国际环境安全的实质及其动力源泉。而实践方面更是困难重重。首先,仅有一小撮富裕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能够幸免环境问题引发的暴力冲突与安全威胁。其次,国家无法有效治理暴力冲突、遏制威胁、实

现稳定,即使最安全的国家也很难采取最确当的环境安全回应措施。最后,国家采取遏制战略打击境外的潜在威胁可能会恶化环境安全问题。

环境安全的概念、原因、威胁及其应对措施仍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阶段,学界还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认同。二十余年的学术争议不断激发学界的研究灵感,并深化民众的环境安全认知,这都有助学界就那些悬而未决的环境安全问题达成一致。实际上,每个环境问题的众多研究课题都能够推动未来环境安全研究与实践向前发展。

编辑 邓文科

Paradigms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Research: Comparison and Contents

LI Jianfu¹

(1.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 carried out in two distinct paradigms, namely problem-solving theory and criticism.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at certain causal relations exist between environmental conflict and the resource scarcity, mal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etc., which are not direct and many factors are involved. It should be mentioned that there is a clear boundary between environmental conflict and the war among nations. All the countries are striving to alleviate the side-effect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 by adjusting their national strategies. Meanwhil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sparing no effort to construct the post-Westphalian system of governance in order to realize environmental peace globally. By contrast, criticism challenges the application scope and solutions proposed by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claiming that the environmental conflict will not happe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espite the exhaustion of resources. The reas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alternative ener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makes it possible to meet energy dem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o that the environmental conflict could be avoided.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state i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s also criticized by the criticism, which advocate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new discourse for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trength. Also, criticism provide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issue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and argues against the cause, influence scope of, and solutions to climate chang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onflict; environmental peac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criticism studie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